

※ 採訪報導 ※

「書籍的一百種面貌——文學與媒介： 從寫本到數位」研習營側記

林小涵^{*}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與現代文學研究室共同規劃舉辦「書籍的一百種面貌——文學與媒介：從寫本到數位」研習營。考量 COVID-19 防疫安全，研習營改為線上授課。雖然老師、導師、學員們少了傳統透過課後閒談發展情誼的機會，但從實體轉為線上（數位）授課、討論，饒富趣味地呼應著研習營主旨——每位參與者皆切身體驗了媒介與技術如何影響人類社群互動學習的方式。

研習營三天的課程中，安排九場深富知識性與啟發性的講座，討論範圍跨越古今、中西，主題包括書籍與書寫的形式、中古寫本、文學與圖像、出版與明清社會、歐洲啟蒙時代寫作文化史、晚清民國報刊、當代數位科技等。希望藉由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重審書籍出版在文學、藝術與文化史上的意義。每日講座結束後，學員們在各自導師的帶領下，進行分組討論，並於次日一早課程開始前與全員分享，激盪彼此觀點。為了增進學員、導師間的對話，最後一晚的小組討論改為二組共同進行。新的討論對象、模式，加上研習即將結束的離情依依，使得這一夜的交流特別令人回味。

一、圖書的形態和讀書法：從卷子到冊子

研習營的第一場講座由大木康老師主講，主持人胡曉真老師以大木老師與文哲所長期的學術情誼開場，鼓勵同學把握向大木老師請益的寶貴機會。大木老師感嘆

* 林小涵，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項下科技部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

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包括本次研習營在內的許多學術活動都改為線上會議，雖然能跨越地理空間的限制，卻有無法與各位老師、學員齊聚一堂的小小遺憾，期許未來有更多與大家實際進行學術交流的緣分。

大木老師從自身經驗切入，說到因一般學術書籍較厚重，通常留在研究室或家中研讀；而開本較小、重量較輕、便於攜帶的「文庫本」書籍，則常於通勤途中隨時翻閱。不同書籍形態，勢必影響讀者使用它們的場合以及方法。

接著老師指出中國書籍史上兩個重要的變化契機：其一，東漢作為書寫材料的紙張發明後，書籍的形式由竹木簡（簡牘）逐漸轉為紙本；其二，唐宋時期印刷術發明，雖然鈔本並未因此消失，但刻印促進了書籍的傳播。早期的書籍以竹、木製成的簡牘為多，平時捲起存放，閱讀時再展開。中文「冊」一字，便是竹木簡材料——木片與繩子的象形；「卷」一字，既指古書中的篇章段落，也指竹木簡的物質形式。紙張發明後，延續之前竹木簡書籍收卷、展讀的使用形態，是為「卷子本」，在中國流行了約八百年的時間。由於卷子本一紙連貫到底，沒有分頁，不便檢索、查閱，因此後來出現經折本、龍鱗裝等新的書籍形態。這些隨著印刷術發明而出現的「冊子本」書籍，成為此後中國書籍的主要形式。

大木老師列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裝訂方式，圖解介紹線裝書的裝訂過程，並解說中國、日本、朝鮮線裝本物質形式上的差異：中國線裝書採四眼裝訂，朝鮮本則常用五眼裝訂，與日本線裝書的書皮都較中國線裝書來得更厚。

初步介紹中國書籍形態變遷史後，大木老師進一步舉例說明，書籍形態的變化，如何影響讀書法。如顏之推 (531-591)《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其中「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生動呈現六世紀中國士人閱讀「卷子本」，仔細展讀、耐心愛護，敬重書籍的使用態度。相對地，宋代張耒 (1054-1114)《明道雜誌》載：「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由此反映，到了宋代，學者所讀之「書」已經是「冊子」的形態，便於翻閱，加上印刷書籍數量大幅增加，取得相對容易，以致學者開始「略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

再如蘇軾 (1036-1101) 感嘆，隨著雕版印刷書籍（冊子）增加，士人閱讀仔細

的程度反而不如以往，其〈李氏山房藏書記〉云：「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蘇軾指出，雕版印刷發明之前，書籍難得，讀書人習於透過傳鈔、背誦獲取書籍內容，因此通讀銘記於心乃常態；印本（冊子）時期，書籍相對易於取得、翻閱，卻同時出現學者讀書粗略，甚至「束書不觀」、「益以苟簡」的現象。宋代黎靖德輯《朱子語類·讀書法上》也云：「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

讀書法之外，書籍形態也影響其篇幅與使用方式。大木老師對照唐宋時期類書的編纂：唐代歐陽詢(557-641)主編《藝文類聚》一百卷、徐堅(650?-729)主編《初學記》三十卷，兩部書籍卷帙數量相對較少，這是因為卷子本不易檢索，一百卷大約是檢索可行的上限；到了冊子本時期，李昉(925-996)主編《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文苑英華》一千卷，王欽若(962-1025)主編《冊府元龜》一千卷，這幾部宋代官方類書卷帙規模遠高於前兩部書，正是因為「只有冊子本時期才有辦法在卷帙如此龐大的書籍中檢索，卷子本完全是不能想像的」。

最後，大木老師回溯演講一開始談到，書籍裝訂方式中的蝴蝶裝與線裝，分享日本古籍裝訂職人陳述的蝴蝶裝裝訂流程，用以說明為何明代後期蝴蝶裝被一般線裝書取代。由於蝴蝶裝的製作方式，是將書頁兩兩背面用漿糊黏貼，需靜置約二週等待陰乾，才能成書。相較之下，線裝僅需要打洞、穿線，十分快速，能夠即時上市。在此脈絡下，明代字體也與宋體有明顯區別。宋體曲線較多，字體大小、排列方式不一，整體較具美感，但刊刻較費時；明體筆劃橫、豎及排列方式皆整齊，易於快速雕刻。書籍裝訂方式的選擇、印刷字體設計的變化，都呼應明代中後期書籍生產數量及速度需求提升的趨勢。

二、抄寫《文選》：解讀寫本中的「痕跡」

雷之波老師說明，本講緣起於他對「文本研究」的關懷。老師首先提問：「如果『文本細讀』的『文本』對象不是形而上的『作品』，而是包含其物質性在內的

文本與媒體的混合體，那麼我們的『細讀』會得出什麼？」這一講希望由此出發，帶領大家進行若干實驗性的思考，探索當「文本研究」加入考慮其物質媒介，對整體學術研究將有何助益，帶來那些改變？老師再拋出新的思考點：「當我們面對一個文本時，是一個主體面對一個客體，還是兩個主體的對話？」若是後者，那麼其中遺留的痕跡，便是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挑戰。

保羅·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984-1979) 對王梵志敦煌詩的考察，是寫本文化研究重要的先行者。近二十年來在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田曉菲、倪建 (Christopher Nugent) 等學者的耕耘下，寫本文化才真正受到學界關注。這些研究啟發後學注意到文本的流動性，以及創作、詮釋的不穩定性。雷老師提出可進一步思考的幾個面向：首先，深入思考「流動」的具體性質，體察流動性在個別場合、文本、文體間的差異。其次，體認學術典範與文化實踐層面之間存有落差，避免機械地套用，或將寫本文化視為唐以前文學文化研究的一切。其三，因為「寫本的文字訊息，不是單面向的」，因此我們不應止步於寫本的異文分析，尚可透過由寫本文化推衍出的文化想像，進一步思考如何拓展寫本研究的闡釋空間。

在帶領學員們一同分析敦煌文書 S. 3663 前，老師先簡要介紹《文選》從七到十二世紀的編纂、注解過程，指出現在可見的《文選》版本都能溯祖至十一世紀的秀州州學本，但各自經歷不同編刊者的修改，與寫本已相當不同，成為《文選》校勘學的挑戰。老師藉由比對傳世《文選》與《晉書》中〈嘯賦〉的異文，說明僅據異文進行文本詮釋，往往帶有主觀性。過去的《文選》研究，多以傳世文獻為討論文本，後來學界留意到敦煌文書。比對敦煌文書 S. 3663，可發現當中寫本《文選·嘯賦》的內容並不同於傳世《文選》，反而是與傳世《晉書》相同。這個案例提供對《文選》、《晉書》中〈嘯賦〉異文問題新的思考方向，也更加突顯《文選》傳承譜系的複雜程度。

因此，校勘學不再只限於比對版本優劣，或判斷某一文本正確／錯誤。在寫本文化視野下考慮的問題應著重：文本的錯誤或改動如何產生？留意改動的動機及各類改動間的關係；跳脫單一、封閉的文本概念下「正確／錯誤」文本想法，觀察它們的差異並思考背後的文化意義；更進一步還可以發揮寫本的闡釋力量，嘗試設想，即使有從未經過任何改動的文本，若要修改，可能如何改起的種種問題。雷老師指出，這種異文與改寫的痕跡（或是根本沒有這些痕跡的文本），往往很不容易解釋，但瞭解文本在不同媒介中如何發生流動，正是寫本研究的重心所在。

接著雷老師提問：「文本／寫本／書籍只是用來讀的嗎？沒有別的用途嗎？」不同於過去研究者專注於字詞，老師示範如何從「視覺」效果的角度解讀永青本《文選注》，並請學員們以寫本文化的思維解讀敦煌文書 P. 2528。同學們的發言相當踴躍，注意到正文背後的字跡、文字的空間配置與行距、墨筆／朱筆的使用、塗改與空白等問題。老師讚許之餘，說明希望透過對敦煌文書 P. 2528 的討論，讓學員們感受「寫本生成的痕跡」，並思考：「寫本與印刷書籍的閱讀效果差異為何？為什麼不一樣？」老師認為，印刷書籍的「時間經驗集中在印刷那一片刻，短暫時間內產出多個（未必大量）文本分身。而寫本則反映著一個漫長的時間：宏觀來說，寫本融合了該文獻流傳的整體時間於一身；微觀來說，寫本體現了從書寫到校正、閱讀眾多時段的痕跡」。

第二場小討論細讀敦煌文書 S. 3663，同學們留意到詩句內容的反諷性與副文本的形式，老師同意學員們的觀察，也提醒大家，敦煌文書 S. 3663 寫本可見不同時段書手（抄寫者）、校對、讀者等參與者各自留下的痕跡，相當複雜且有趣，我們可以從遺留的線索，試著推測他們的關係。敦煌文書 S. 3663 的例子說明寫本研究「細讀」的重要性，同時也使我們必須承認研究的過程中，問題可能仍多於答案。研究者唯有透過對有限的物質進行縝密觀察，將限制轉化為闡釋空間，才能逐漸深入問題，同時開啟新的對話。

主持人楊明璋老師十分贊同雷老師對寫本流動性的分析，並分享自己對敦煌文書 P. 2528、S. 3663 的觀察，推測前者右上角的文字可能是「蘇州碼」，而書寫者之所以未在文末繫年，可能因為永隆年號僅使用一年即改換。楊老師另補充《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對敦煌文書 S. 3663 詩句的不同釋讀，提問：「為何從敦煌文書探討寫本文化？」、「為何挑這些文本？」雖然雷老師受限於會議時間未及詳細回覆，但這也成為學員們未來探究寫本文化時，絕佳的線索與課題。

三、宋元時期雕版印刷中的圖像傳播

石守謙老師因中研院史語所近期出版《傅斯年眉批題跋輯錄》，採用數位照相的方式出版，從而思及以複製技術傳播書法文字藝術，在中國歷史上應可上溯至宋、元時期，其中南宋《鳳墅帖》的出版，尤其值得注意。

《鳳墅帖》為南宋江西廬陵人曾宏父所作，原書分前帖、續帖、畫帖、附錄，

共四十四卷。現僅存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殘帙一部，包括《前帖》第十一、十五、十八卷，《續帖》第三、四、十至十六卷，共十二卷。石老師此講從帖學長期發展史的角度，探討曾宏父編刊《鳳墅帖》以「經典延續」的意圖，並就時空脈絡分析為何《鳳墅帖》在宋代少有翻刻，是而流傳不廣，終至殘缺。

在《鳳墅帖》之前，中國書法史上的法帖經典是北宋《淳化閣帖》。此帖僅收錄自漢章帝至唐高宗時期，帝王、朝臣及著名書法家之作。曾宏父製作《鳳墅帖》則加以延伸，廣為收錄宋代名人墨跡。石老師以黃庭堅(1045-1105)〈草書詩作〉及范成大(1126-1193)〈范石湖遊大仰詩〉兩件作品，解說《鳳墅帖》複製時如何講究保留真蹟的細節。

除了有心保存宋代名家書蹟，曾宏父也有意藉《鳳墅帖》傳存當代名人書信內容。石老師指出，雖然《淳化閣帖》也收錄尺牘，但多為利於後人學習臨摹的大字；《鳳墅帖》中的尺牘字體小，較不具上述功能，曾宏父之所以仍選擇予以翻刻，當是出於保存史料的意識。例如《鳳墅帖》中收錄岳飛(1103-1142)〈與通判學士書〉與秦檜(1091-1155)〈別紙勤懇帖〉，曾宏父並作跋語對兩封尺牘進行說明、鑑賞，公允評述岳飛、秦檜兩人之政治作為。老師推論曾宏父可能因其父曾任宰相，對官場有一定的熟悉度，因此在《鳳墅帖》中收錄多封秦檜書信。與史料保存意識相應，曾宏父經常在跋語中以「真蹟」強調資料來源及可靠性，在作品結尾詳細注明總共刻了多少字、使用多少片石板，並標明刻印工程乃在其家族「廬陵鳳山別墅」完成。

石老師進一步分析曾宏父以書簡入帖的意義。如朱熹(1130-1200)並不以書法著稱，曾宏父應是著眼其學術、政治身分，將其信札刻入書帖中。老師認為，《鳳墅帖》無論是對朱熹信札中小字書體細節的保存，或者如前述以大字呈現范成大〈范石湖遊大仰詩〉，皆顯示曾宏父用心保存原件大小，刻意追求「如實複製」。

再比對《鳳墅帖》及其追摹的典範《淳化閣帖》之異同。宋代進入十一世紀，出現專業的文物鑑定者。士大夫階層如米芾(1051-1107)等「文物鑑賞」專家，多批評《淳化閣帖》之編者王著識見不精，多有錯誤。促使曾宏父編刊《鳳墅帖》時，特別強調「並對真蹟」，如實無誤。兩部刻帖翻刻流傳的情況也有差異，《淳化閣帖》為宋淳化三年(992)太宗(927-997)敕造，常作為禮物賞賜予臣子，受贈者經常出於分享榮耀而翻刻。相對地，《鳳墅帖》為私人刻印，又為了兼存真蹟與史料，收錄許多不一定為書法名家所寫的小字信札，如此需要技藝精良之工匠長時

間投入，從而提高了刻石成本。相對小眾的內容及偏高的刊印成本，都成為《鳳墅帖》不被後世翻刻複製的原因之一。《淳化閣帖》、《鳳墅帖》雖然有諸多差異，但都屬於文獻傳播中的「複製」模式。石老師將此傳統上溯至漢代《熹平石經》——這七部相傳由蔡邕 (132?-192) 所寫，使用四十六塊石碑，多達二十萬九百一十一字的經典，設立於太學前供太學生拓印學習。《熹平石經》的例子說明在印刷術發明前，拓印實為重要的文本複製方式。這種方式既促使知識「標準化」，將經典刻石、立於太學前，也使之具有「神聖性」。

主持人廖肇亨老師讚嘆石老師演講內容豐富，判斷關鍵問題的眼光精準，並總結石老師此講涉及文獻史料、佛教與山水畫的關係，從刻帖出發，向外涵攝出版形態的變遷、文獻史料內在曲折與書學發展的關係等議題，令人獲益良多，啟發深刻。

四、千年古籍世界：版本知識概說

研習第二天的第一場演講由林桂如老師主講，主持人劉瓊云老師介紹，主講者不僅是大木康老師的高足，兩場演講內容其實也相互輝映。劉老師談到上世紀中葉發展於法國的書籍史研究，對版本學的反思與開拓，認為書籍文化研究不能只停留於版本學，但版本學卻是其重要基礎。此外，細察大木康、林桂如兩位老師演講背後的用心，均提示研究者在取法西方書籍史研究進路之餘，不能生硬套用，應從中國自身傳統出發，加以調整、應用。

林老師開宗明義說明：「版本學，是身體力行的學問。」本講原訂將帶著學員走訪國立故宮博物院，親眼觀察、認識不同年代、版本的代表性書籍，可惜受疫情影響無法成行，因此老師從原訂書單中挑選八種書籍，依時代及其反映的版本知識展開本次演講。

第一種是蒙古乃馬真后三年 (1244) 刻道藏本《雲笈七籤》，此本是現存元朝最早的書籍。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其裝訂形式為包背裝，但林老師細察此頁書影難以推斷其裝訂形式，這個例子也說明，線上資源雖能為書籍版本研究者帶來便利，但仍有許多重要訊息仰賴實際訪察文物，或是與當地研究者的意見交流。老師再舉元泰定元年 (1324) 西湖書院刊本《文獻通考》，其裝訂形式為蝴蝶裝。書院出版是元代書籍出版的特色，顧炎武 (1613-1682)《日知錄》卷十八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

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列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行也，三也。」書院所刻書籍以內容正確、刻工精緻著稱，更因板本不必收藏於官府，因此容易流通。元代書院除了自行出版書籍，也合作為路學刊書，如大德年間有江浙行省轄下九路儒學協力刊刻的十七史。元亡後，這些書的版本由明代南京國子監繼承，繼續修補刊印，品質仍佳，因此「南監本」書籍在明代為世所稱道。元代的出版雖然有上述特色，但在中國印刷發展史中，一般仍被認為是相對低落的時期。因元代早期不行科舉，重辦科舉後朱子學又趨權威化，造成出版的書籍內容偏於單一，多為簡略版或選集，較少見全集。

接著林老師從出版機構、刊印技術、出版物類型三個面向介紹明代的出版文化。老師指出，明代出版特色之一為藩府刻書，其中又以寧王朱權(1378-1448)最為知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漢唐秘史》即為明建文三年(1401)寧王藩府所刊。萬曆年間，吳興閔齊伋(1580-1662?)、凌濛初(1580-1644)兩人所屬家族出版多色套印書籍，在市場上引發廣大迴響，反映明代刊印技術進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李長吉歌詩》為凌氏刊朱墨套印本，家族成員凌雲更以五色套印方式刊行《文心雕龍》(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高價昂貴的多色套印本興盛，與都市經濟發展有關，也顯示購買者的社會階層變化。讀者群出現富有商人階級，不但講究書籍內容，更追求精美的外觀。《西遊記》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是現存最早《西遊記》刊本。世德堂本現存四部，其他三部分別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日本日光慈眼堂、日本淺野圖書館(殘本)。磯部彰在《『西遊記』形成史の研究》中比對、考證故宮、天理圖書館兩種藏本，前者無補刻葉，為重印本；後者有補刻葉，為補修本。老師小結明代出版特徵有：印量大增、書籍形式與內容豐富而多元。此盛況與明代江南城市興起(也包含常州、湖州、徽州、南昌等中小型都市)，積極投身藝文活動的山人、能辨識書籍的藏書家、書賈、胥吏，以及新興購買者的出現等社會文化變遷關係密切。

雕版印刷之外，林老師也簡介明、清時期中國與朝鮮王國的活字印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四年(1726)印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為武英殿以銅活字本排版印製。武英殿是清代朝廷出版機構，除了銅活字外，也以木活字刊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話》提及明弘治年間無錫華家會通館、安

家桂坡館的銅活字出版活動。《書林清話》卷八「日本、朝鮮活字板」也談到朝鮮王國的銅活字印刷，其版本特徵為：版心魚尾陰文設計、開本較大、沒有刊記，也可見使用藍印內封與合體活字的例子。因為鑄造銅活字價格昂貴，主要刻造機構為王室成立的校書館（芸閣）。以銅活字排印的內賜本書籍印量不多，每次約為數十部。由於皇家授贈的內賜本象徵極高榮譽，有的受賜者會再以木版翻刻後流通，以示顯要。官署以外，寺院也是朝鮮的重要出版機構，除了刊印佛教典籍，地方官署或兩班階級也會委託他們刊刻書籍。

在課前，林老師請學員們分組預先閱讀、討論《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卷八「宋、明、日本、朝鮮活字版」兩部分。在演講的後半部，老師安排學員依組別分享各自的觀察，並針對報告的關鍵處與學員們往復問答。在活絡氣氛中引導學員領略藏書家「書話」內藏的深意，體會葉德輝對毛晉（1599-1659）的批評，其實是藉由評論遭逢明清易代的藏書家毛晉，寄託自己經歷清末民國巨變的隱微心曲。老師以葉德輝《書林清話·敘》中「吾書雖廢於半途，藏書家固不患無考證也。……當今天翻地覆之時，實有秦火胡灰之厄。語同夢囈，癡類書魔，賢者閱其癖好而糾其繆誤，不亦可乎」，代為結語，並勉勵受疫情影響，未來變得難以預知的我們。

五、沙龍談話與啟蒙思想之間的歷史與研究： 法國書籍史與書寫文化史

第五場演講將目光從東亞轉向歐洲，主講人秦曼儀老師透過十七到十八世紀法國貴族沙龍的社交談話研究，向學員們介紹書籍史研究理論的精要處，以及歐洲啟蒙思想背後的社會文化史。主持人楊貞德老師點出，本講藉由討論法國書籍史諸面向，反思既有研究方法，不僅談論書籍作為「事件」所涉及的編輯、出版、販售、閱讀、藏書等活動，也關心書籍與所在世界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條件如何交互影響，並嘗試穿越這些複雜現象，找出線索，深入瞭解書的歷史意義。

秦老師選取「法國書籍史與書寫文化史」、「近代早期」、「沙龍談話」、「啟蒙思想」四個關鍵詞，指出法國書籍史研究已從二十世紀六〇至九〇年代關注書籍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轉向更進一步關注信息媒介之多樣性（從印刷書擴及至印刷品）

及其流通與文化影響。接著介紹書籍史研究轉向背後的歷史脈絡：兩次世界大戰後，學者對於十九世紀以國族為中心的史學書寫有深刻反省。法國大革命以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法國學者，對此事件所造成的一系列與傳統和歷史切割的作為及非理性意識形態與社會分裂，深感不安。至十九世紀後期，作為平息不安的方式之一，保守派作家學者發展出一套史學論述典範，將源自十七世紀象徵文化品味的貴族沙龍談話，視為十八世紀知識理性及啟蒙的前驅，以此代表法蘭西民族精神的甜美與光亮。然而二十世紀中葉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學者們審慎重估如此為形塑國族意識所建構的歷史圖景，致力於探查典範與歷史事實之間的落差，以及當中多層次的意義。

承此思路，秦老師個人研究興趣在於近代早期貴族階層與王權的關係，以及貴族生活與社會文化、啟蒙運動的關係。此講計劃引領學員們探索的具體問題是：稍縱即逝的談話時光、談吐的風采、話語的機智，是如何傳世的？書籍的物質形式如何影響沙龍談話的傳播？

秦老師以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和 Aldus Manutius (1449-1515) 兩位文藝復興時代重要的人文學者之間的通信為例：Erasmus 致信給既是學者同時投身於印刷產業的 Manutius，希望 Manutius 能為自己印製譯作。Erasmus 在信中讚美 Manutius 刊行書籍的高品質，及其學術成就與美感品味，同時並抱怨自己在巴黎出版的著作中的排印錯誤，於信末表達希望 Manutius 以小號鉛字為他印行著作的想法。秦老師由此繼續引發學員思考，書籍的字體、版面設計與排版裝置等文本質感，如何有助作者在讀者群當中取得名聲。而作者透過書籍物質細節所建立的形象及名聲，又如何有助其擴大社會影響力，既串連歐洲各地同儕網絡，也爭取宮廷和貴族統治階層的支持。

秦老師接著說明十六到十七世紀，從宮廷到沙龍，王權與貴族間的權力角力與書籍出版息息相關。當時王權提拔新興的布爾喬亞 (bourgeoisie) 成為行政官僚階層，與貴族相抗；貴族則透過出版建構「執筆的尚禮君子」形象，廣泛從事文學、科學、道德、政治的書寫與討論，以此回應殖民貿易和「科學革命」帶來的經濟和知識轉型，與王權抗衡。拉侯什傅科公爵 (François VI, deuxièm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pair de France, 1613-1680) 出版的《箴言錄》(*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是具體的例子。拉侯什傅科公爵在書中強調：「我尤其喜歡與一位有智慧、聰穎的人一起讀書，因為如此一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反思所讀之

物，反思的成果又使談話成為一件最愉快，最有益處的活動。」試圖形塑自己靈活入世、多聞博識的讀書人形象，和與「世」隔絕的「書呆子」、「學究」，以及專靠書寫謀生的職業作家相區隔。

此外，貴族們又基於「我手寫我口」的觀念，將沙龍中的談話化為文字書寫，如法王法蘭西斯一世 (François I, 1494-1547) 之姊瑪格麗特 (Marguerite de Valois-Angoulême, 1492-1549) 寫下《七日談》(*L'Heptaméron*)，以呼應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的《十日談》(*Decameron*)。又如拉法葉夫人 (Marie-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 Comtesse de La Fayette, 1634-1693) 的《克萊芙王紀》(*La Princesse de Clèves*)，以對話體的愛情小說，談論政治。這些例子足見法國女性作家與男性作家間的競爭，也可見兼具人文學知性傳統和貴族社交習慣的溝通形式，已進入知識寫作和文學創作領域。這類談話、書信體書籍大行其道，不僅有當時識字率提高和印刷書籍產量大幅成長的背景，也促成十八世紀深受女性作家和啟蒙哲士青睞、讀者閱眾喜愛的書信體小說的誕生。

最後，秦老師討論閱讀材料中，《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第六章〈讀者對盧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帶領學員注意商人讓·韓松 (Jean Ranson) ——一位十八世紀的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迷，如何閱讀盧梭。韓松重視盧梭著作的開本、用紙、鉛字粒的品質，乃至氣味等物理性特徵。對他而言，書籍不只是用來「讀」，還有觸感、視覺性與味道。老師以此引出本講結語：書籍與書寫的文化史涉及經驗、常識與知識，雖然書寫、閱讀書籍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可謂「平凡」，但考量識字率的歷史演變、手工製作花費的時間，對近代早期的讀者來說，書籍的普及實為劃時代現象，改變了整個書籍生產與接受社群的物質感受和身體經驗。由此觀之，書籍與書寫文化研究的不凡之處，不僅在於關注書籍的內容與物質性，更來自研究者進入書寫物的內、外世界，深究其中的連結關係，以及整體人文環境動態變化開拓出的研究視野。

六、史書、類書與小說： 議論空間與實用知識場域的形成

劉瓊云老師希望透過書籍史的視野，探索明清小說研究的新可能。本講把眼光

轉向過去學界所界定的「平庸」之作，將這些書籍置回原初生產的場域，重新思考它們在明清文學文化史中可能的意義。主持人楊玉成老師就「平庸」之說引出主講者近年來研究明清通俗讀物與小說的研究成果，展現精到的眼光與觀念，從看似無足可觀的作品中發掘傑出的新議題。

劉老師開場敘及自己對於書籍史的興趣，萌芽於過去實地走訪各個圖書館查閱古籍的經驗，過程中開始反思，既有的小說研究取徑，可能如何開展。老師認為，前輩學者研究經典作品的成果已然豐碩，相對而言，如何更恰切了解「非」經典之作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及其與文學經典之間的互動關係，值得開掘的空間仍多。對此劉瓊云老師提出「生態圈」概念，認為過去一時一地的文學文化景觀，實由名山大川（文學經典）與野花小草（非經典之作）共構而成，對於兩者的研究若能彼此挹注，當有助我們更深入理解文化生產的脈絡，以及當中讀者的思想、欲望、需求、喜好等種種社會生活情態。

老師從閱讀材料中何予明《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的論點切入，指出文中經典殿堂／稗販市集的對比，正彰顯小說駁雜、蔓衍、無特定邊界的特質。「稗販之學」，乍看之下似乎負面雜蕪，實則具備延展變化、旺盛的生命力。從考訂、學術的角度來看，草率、拼湊乃至對文本傳續形成破壞的書籍，在歷史上卻能使一些讀者從中享受到此前不易取得的信息，以及時下的文化風潮和多樣的閱讀生活。被認為體現了庸俗商業主義的圖書，其實透露晚明新興讀者群的需求，同時改變時人的社會生活與感知模式。

在此基礎上，劉老師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小說」既是文學，亦蘊含「知性」。特別在晚明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投身出版的下層士人，往往扮演「知識中介」的角色。其編輯與寫作活動，或搜集、重組前代記述，或將上層經典、文史書籍加以簡化及改寫，重新編制與配圖，以求「通俗」。如此既能拓展讀者群以利行銷，亦符合儒家教化之旨。「知識」在文化生產場域中於是不斷經歷流動轉譯、擴張傳播的過程，其內容樣貌亦隨著讀者的需求及喜好而變動。此講以晚明流行的明初開國敘事為例，帶領學員們觀察開國功臣如朱亮祖（?-1380）、劉伯溫（1311-1375）等故事在史書、類書與小說中變化的樣態。

劉老師首先介紹陳建（1497-1567）《皇明歷朝資治通紀》（以下簡稱《皇明通記》）與郭勛（1484?-1542）《國朝英烈記》間的關係，解說如陳建這類關懷國事的士人學者，或如郭勛這類開國功臣之後，他們的出版活動與政治考量，如何影響二書

的編寫策略。由於《國朝英烈記》今不存，劉老師以與此書承襲關係較近，也是現存較早的《皇明英烈傳》版本——余君召三台館本，引領學員從書籍的副文本、排版編輯及閱讀輔助符號，推敲讀者們「可能」讀到了什麼？三台館本一再標誌小說敘事出處來自《皇明通記》、《聖政記》等史書，強調其「近實性」；開篇羅列「元功十二人」簡敘其出身與功勳，宛如「主要人物介紹」；插圖標題及回目安排連結人物與主要事件，協助讀者掌握情節進展；正文敘事引用鐵卷文、太祖御製詩，藉由重製包裝朝中使用流通之文件及帝王詩歌，降低讀者進入「歷史」知識圈的門檻，製造出一般讀者亦得以「與聞」國事之感。

接著劉老師介紹刊行於明末的《鼎鉞國朝史記事實類編評釋日記故事》，說明除了史書、小說之外，這種專載明代人物故事的類書，也發揮傳播國朝知識的作用。此部類書中有不少關於朱元璋謀臣劉基的記載，類似的內容亦見於《皇明通記》、《英烈傳》及話本小說如《西湖二集》。在晚明書籍市場中，這些看似不同類型的書籍，其實共享許多知識內容，只是繁簡不一、精粗有別。在《西湖二集》〈劉伯溫薦賢平浙中〉一回中，作者周清源將相關記載再做創造性的衍伸改動，回應明末的社會關懷與知識趣味：首先，小說作者強調「書中自有太平策，書中自有擎天筆，書中自有安邊術」，突顯劉伯溫的智謀韜略、朱亮祖的水戰專長與「書籍」的關係，將元代繪製《輿地圖》的朱思本(1273-?)嫁接成為朱亮祖叔祖，遺下一部「沿海要務經濟之書」《測海圖編》，成為劉、朱輔佐開國王業的重要知識基礎。其次，小說推揚《測海圖編》，又與晚明倭患的社會實況密切相關。除了文字敘事，周清源又在此回末附上多種取自戚繼光《紀效新書》的海戰火器、彈藥的圖解與使用說明，加上一幅東南沿海地圖。透過正文內部和周邊的「知識扦插」與創構，共同營造出一種「紙上談兵的趣味」。

最後，劉老師提出幾點與學員們共同思考的方向：其一，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提到，由於宋代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帶來的危機感，引發「中國意識」的強化。那麼上述的晚明書籍，對當時國朝意識的建構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是否也成為另一種形塑「我朝（中國）意識」的力量？其二，若上述書籍的傳播帶來新的讀者，是否意味著得以參與議論國事者的階層擴張？其三，若將清代才學小說與明代周清源《西湖二集》一起觀察，是否可說，盛清下層士人透過小說抒發經世懷抱，此風在明末已見其端倪？其四，我們對明清小說的研究，除了評判高下外，進入其生產脈絡，捕捉作品內蘊的文化樣態及社會心理，是否也成為另一種可能的途徑？

七、機械複製時代的「連載」：從章回到網劇

研習營來到最後一天，演講主題的時代也推展至近現代。主講人周成蔭老師首先分享在其研究歷程中，如何不斷思考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係，又如何處理研究材料，以捕捉不同時代人們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由此引發思考：身處「現代」的我們，面對社群媒體、Instagram 上數量「爆炸」的文本，該如何刪選、收藏並進行研究？又是否該因應新時代，尋求新的跨媒體理論？老師也藉由梳理美國學界自上世紀後期至今，文學研究方法的變化，提醒學員們在運用理論時，應意識並反思這些理論原有的文化脈絡，適切融貫，避免生硬套用。

在進入正題前，周老師請線上師長、學員就目前內容提出心得或問題。秦曼儀老師呼應周老師對既有認識論、方法論的反省，劉瓊云老師則提醒學員，本研習營的主題——書籍史研究，始自西方特定的歷史情境，舉辦此研習營的目的並非為了推廣單一的學術研究方法，而是期望匯聚關心書籍、傳播媒介、書寫物質性等課題的學者們，透過分享彼此不同的專業、學術關懷及研究方法，盡可能向學員們展示多樣的研究進路。也有學員好奇，網際網絡 (Internet) 創作在疫情影響下越加發達，既有的文學理論是否足以討論此文化現象？周老師認為，這個問題正突顯如何篩選文本、反思「文本」概念，是當前文化研究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本講的核心關懷之一。

周老師透過跨媒體敘事、故事，展開對「文本」的探問與思考。近年來，無論大企業、廣告公司，抑或記者、環保推動者們，紛紛訴諸「講故事」的方式，推廣各自的商品、理念，或記錄社會文化，他們運用新的媒介、技術（VR [Virtual Reality] 或 AR [Augmented Reality]），透過藝術或遊戲的方式敘述故事。跨媒體表述交流形式的出現，不斷改變「文本」的定義與內涵。過去文學理論強調「文本」，相對較忽略「文本」與其周邊世界（包括預設觀眾及讀者）的互動性。對此，周老師以故事「文本的關連性」稱之，認為「文本的關連性」的概念更能體現故事講述者與聽／讀者之間主、客體不斷換位對話的現象，為文化史或文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周老師強調，近年英、美小說出版界越來越重視敘事的「連載」性 (seriality)。故事不再是單線性的故事 (story)，而可以「多線」同時發展，構成一個不斷連結擴張的網狀「世界」(world)，甚至「宇宙」(universe)。與此相類，故

事也在「粉絲文化」(fandom) 中不斷被多線放射延展，形成作者與讀者身分不斷互換，共同創作的文化現象。我們如何理解、分析這種因新媒體而新生的創作方式與文化活動，成為另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

接著周老師分享更多跨越傳統平面視覺感官的「文本」新形態。如 Nick Sousanis 所著 *Unflattening* 一書，挑戰過去以「文字」為主的知識傳統，以漫畫拼貼 (collage) 的形式「論證」人類的認知活動，其實向來是文、圖多重視角密切互動構成。又如 Mary Caton Lingold 設計、架構「聲音字典」(Sonic Dictionary) 網站，搜集多達八百種聲音，包含水滴、菜市場叫賣、抗議等不同聲音，予以分類，將聽覺體驗視為一種文本，透過字典的形式捕捉、排列生活中的種種聲響。此外，推特 (Twitter) 的互動性，促成新的敘事模式，如 Terence Eden 在推特上以“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為題，建構多線發展的故事場景，供讀者於其中自行選擇連結，從而得出不同結局。Sarah Koenig 則創立 Serial 網站，參考過去報刊的「連載」模式，改以 podcast 形式「連講」故事。這些例子呼應演講一開始提到「如何歸類文學」的問題，也顯示既有的文本、敘事理論和研究方法，尚待開展。史丹佛大學於二十一世紀初，引入大數據 (big data)、功能性磁共振造影 (fMRI) 等「科學」建置，以研究讀者的閱讀反應，既取得若干成果，但也不無爭議。

在演講後的提問時間中，周老師鼓勵學員分享自己對跨敘事、文本、檔案，及文學研究對象等議題的看法，獲得學員們的熱烈回應。有學員分享自己對中國廣電局發布的二十條「新增指引」，是否影響 BL (Boy's Love) 戲劇尺度的觀察；也有同學思考大量被創作的同人故事中，廣受歡迎者似乎有成為「新經典」的趨勢，這是否也會改動學界過去關於「經典化」議題的看法。周老師以夏洛克·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故事在十九世紀末的走紅，聯繫當代的同人創作現象，回應並說明「什麼是經典」，與不同時代的審美觀及社會文化風氣息息相關。柯南·道爾 (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 1859-1930) 創作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符合十九世紀末英國追求以「科學邏輯」解決問題的社會風氣；二〇一〇年走紅的 BBC 電視臺《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 中，營造福爾摩斯與華生 (John Watson) 間若有似無的情愫，則使二人在當代多元性別文化下，成為同人 CP (Character Pairing) 創作的 super model。

八、晚清民初報刊研究：文本與文本之外

呼應上一講對新興文學媒介的討論，本講聚焦「報刊」——風行於晚清民初中國的新媒介。主持人李仁淵老師指出，晚清民初報刊既是當時的新興傳媒，也是研究近代中國都市文化、思想史、消費文化、商業、文學各項論題的寶貴材料。近年來近史所建置許多晚清民初報刊資料庫，包括：「婦女雜誌資料庫」、「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婦女期刊作者研究平臺」、「近代城市小報資料庫」，結合報刊與數位人文研究。學者們對於報刊資料的性質與解讀問題，亦多有討論，值得持續關注。

連玲玲老師從研習營名稱「書籍的一百種面貌」談起，在探索「書籍面貌」的課程安排中納入「報刊」，促使她重新思考書籍與報刊在形式與知識傳播面的異同處。老師指出，固定的出版頻率、快速的訊息傳播、製造多元聲音的印象三點，是兩者的主要差異。與發行速度相應，報刊被汰換的速度也非常快，反映當時快速的消費主義式文化。在這種出版需求下，報刊的編輯者經常「一人化身多人」，如知名報人包公毅(1876-1973)曾使用天笑、春雲、微妙、迦葉、拈花、秋星閣主、釧影樓主等，近七十個筆名，在《晶報》上發表超過五千篇文章。

力圖向讀者展示「多元聲音」的報刊，在「公共領域」的建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連老師介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指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出現如咖啡店、沙龍、公園等人們彼此交換訊息的實質空間，以及透過報刊所創造的抽象交流空間。在其間，人們交互運用口耳相傳及文字進行對話。報紙打破人一定要面對面交換意見的限制，能觸及不特定對象，並對遠方的事物造成長遠影響。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著眼此種「穿越時間與空間」特性，進一步分析報紙如何形塑民族「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美國漢學界約於一九九〇年代，展開對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公共領域」的辯論。冉玫鑠(Mary B. Rankin)、羅威廉(William T. Rowe)基於晚清中國城市出現全國性的公共領域，新興菁英集團的公共性增強，判斷此時中國已出現「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1937-2006)考量當時菁英公共化未帶來民主化，反對前者的看法；瓦格納(Rudolf Wagner, 1941-2019)則試圖折衷，強調

公共領域是一種社會溝通空間。據此而論，則中國確實存在「公共領域」，但未必與政體密切連結。連老師綜合上述討論，指出：「中國究竟有沒有公共領域？」的問題，其實取決於研究者對「公共領域」的定義，亦即對「公共領域」之界限、範圍、功能的不同看法，也顯示此議題的複雜性。關於中國公共領域的樣態，瓦格納提出三個重要特點：（一）「跨國界」：租界和殖民地，提供華文報紙更寬廣自由的進言平臺。（二）「非同質」：各種身分的人都可以利用此公共領域發聲。（三）「不限於文字論述」：如畫報、慈善活動，亦分別能夠透過影像或實際行動，傳播訊息與新聞。

連老師繼而指出，伴隨史學研究朝文化史轉向，報刊史的研究也不再只關注報紙上的內容，逐漸從言論思想的載體，擴及其中反映的社會文化現象。例如，就報刊的寫作生產可做出以下觀察：（一）對報人來說，既有著截稿日的壓力，也因報刊的市場化、大眾化，出刊速度加快，必須更即時針對市場反應調整創作方向。（二）除了字數限制，連載與專欄等出版形式，也對報刊寫手的創作產生影響。（三）報人身分發生轉變，出現隸屬於報刊的專業化寫手。此外，從社會文化角度思考報刊的出版時，往往須擴及報紙的編輯、作者、讀者、贊助者、插圖的畫師等各類報刊出版網絡中的成員。

老師也提示未來的研究者，除了報刊內文，其副文本同樣也有助建構報刊的歷史，並提供解讀文本所需脈絡。報刊的副文本包括：標題、副標題、欄目名稱、發刊詞、告讀者、編輯語錄、補白、封面、插圖、廣告等，環繞、穿插、點綴於正文本周邊的內容。這些副文本雖居邊緣，卻對中心有整合、控制、遮蔽、拆解的重要作用，既是整個文本的有機構成，也與正文本形成重要的跨文本關係。連老師援引季家珍 (Joan Judge) 在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中提出的：水平式閱讀、整合式閱讀（垂直式閱讀）、情境式閱讀，三種超越報刊文本框限的閱讀方式，具體示範「解讀」報刊的多重可能。在文化史的脈絡下，報刊的印刷技術及其物質性，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議題，有助於從全球視野重新思考中國報刊史研究。

學員們在問答時間討論熱烈，就連老師演講中談到報刊的社會文化、物質面向提問：清末民初報刊作為新形態的媒體，為何採用傳統的線裝裝訂？晚清政府對上海報刊及報刊言論自由的態度為何？老師認為除了從技術、市場因素思考，也可考慮晚清報刊用紙的來源及當時中國紙張製造產業的運作情況。老師援引林美莉老師

〈議政與馴化——上海小報發展史的一個側面〉，回應第二個問題。文中以上海為例，說明即使在租界區中，晚清報刊的言論也不如大眾所想的「自由」。這些政權如何「馴化」這些小報，使其成為維護各自政權利益助力的過程與手法，特別值得留意。

九、現代詩集的故事：物質性與數位化

劉正忠老師透過分享個人閱讀詩集以及蒐羅詩集版本的經驗與心得，帶領學員思考詩歌創作與書籍形式表現之間的關係。老師首先定義「什麼是詩集」，認為詩集具有儀式性、個人風格與多樣性、易於被視覺因素牽動三項特徵。再談現代詩集發展出四大不同以往的特色，包括：（一）富有個性的封面設計。（二）異於傳統詩集常用詩人姓名字號、居室堂號命名，改採「為一首詩命名」的方式名集。（三）詩歌的分集與編排融入作者的創作觀念。（四）取材自西洋詩的詩作視覺呈現。

劉老師從「亡佚中的臺灣詩集」說起，指出在臺灣現代詩約一百年的歷史中，已有不少詩集亡佚。詩集原有的成分，也經常在重排、翻印的過程中消失。以張我軍（張清榮，1902-1955）《亂都之戀》孤本為例，此部原刊本目前僅存於國立臺灣文學館，與影印本、遼寧大學出版社重排翻印本比較後，可發現影印本無法複製原刊本封面的打凹圖文加工，翻印本則遺落了原刊詩集扉頁「抒情詩集」四字。

劉老師再以張默（張德中，1931-）的《臺灣現代詩集編目》為基礎，統計出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灣詩集出版概況從一百五十六本，略增至二百零一本，整體詩集出版數量較同時期的日本及中國少。此時期詩集的出版單位，除了較為知名的藍星詩社、野風出版社外，尚有政府、軍方、大學的出版社。總的來說，商業性偏低，也減少詩集的再版機會。一九七〇年代，由於印刷技術的提升及出版單位的增加，詩集的產量才隨之遞增，是臺灣現代詩集刊行的新階段。

劉老師歸納出現代詩集的物質性特徵為：（一）擁有形體、富設計性的色澤與質感。（二）占有空間、繫住時間，有助詩人主張自己曾存在於時代的詩學場域。（三）擁護原版，抗拒被完整複製。（四）特別用心於詩集的觸感與視覺設計。他以楊英風數位美術館所藏的巴雷（吳望堯，1932-2008）《玫瑰城》詩集封面為例：這部詩集刻意採用版畫風格的主圖，使詩集同時成為一件藝術品。可惜紙本中主圖的質感，數位化後卻難以在螢幕上完整呈現。比對紙本與數位檔案，不僅在顏色和材

質上有所差別，前者標示的出版單位為空軍印書館，後者的卻是藍星書局。劉老師藉此提醒學員，臺灣現代詩的數位化帶給研究者極大便利，但若只依據數位檔進行研究，不免有所疏漏。此外，更有詩集刻意強調自身強烈物質性與獨特性，抗拒任何影印或數位形式的複製。例如一九五〇年代出版的《青春之歌》，以詩人／編者方思的原創詩作，搭配著名藝術家陳其茂（1920-2005）的木刻版畫作品。當中有些頁面設計，刻意將紅色的詩歌文字，疊放在黑白版畫底圖之上，兩者高度融合、難以分割，且明暗層次細緻。這樣的設計，無論影印或數位化皆難以完全複製。

劉老師再以紀弦（路逾，1913-2013）於一九五三年創辦的《現代詩》季刊為例，藉由詩刊封面設計，觀察主編紀弦的編輯考量，及其受歐美、日本藝術作品影響的程度。《現代詩》季刊四種典型封面：（一）極簡風格的封面，將封面當作內頁使用，刊載「前言」、「信條」等內容。（二）盜用法國高克多（Jean Cocteau, 1889-1963）素描作品的封面。（三）不同期數沿用同款設計封面。（四）使用秦松（1932-2007）木刻版畫與檳榔樹圖案的封面。其中極簡風格與紀弦早年在上海編輯的《詩領土》做法相仿，取用高克多素描透露紀弦所習及所好。編排上，紀弦會以較大字體排印他所看重的作品，又為了節省紙張空間，在同一版面並用直式／橫式文字排印。這些《現代詩》季刊的物質特徵，透露當時詩學場域中創作、編輯生產及藝術影響等多項重要細節。

演講的最後，劉老師探討臺灣現代詩集數位化的利與弊。例如中興大學人社中心數位團隊策劃建置的「楊牧數位主題館」，廣泛收錄楊牧（王靖獻，1940-2020）的詩集與手稿。劉老師比對楊牧手稿與結集後詩作，發現楊牧經常在手稿中不斷修改，從中清楚可見詩人激烈自我爭執的痕跡；在結集之後，楊牧基本上不再更動作品。楊牧創作的數位化，有助推動他詩作的手稿學研究。

與楊牧相反，痲弦（王慶麟，1932-）不斷修改、重編已集結的作品，使他的詩作呈現不同層次。痲弦於一九六八年刊行的《深淵》中，自選六十首藝術精純度及原創性最高的詩作；二年後，補入九首詩重刊（晨鐘版）；又於一九七七年增補「二十五歲以前作品集」十八首，收入《痲弦自選集》。在定本《痲弦詩集》（1981）外，劉老師還蒐得至少四十餘首痲弦從未收入詩集的「棄詩」。老師認為，分析痲弦的編輯行動，能夠反映他對自己詩歌的看法。痲弦發表於報紙或期刊、未選入於個人詩集的「集外詩」，都顯示詩集數位化的局限，值得研究者留心。

問答時間，學員們提問十分踴躍。有同學好奇不同版本的詩集中，是否能看出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所謂「靈光」(aura) 的消長、差異？劉老師說明，詩集的原始版本，多半較為重視詩人原初創作的靈感，後期詩集則經常轉向偏重創作技巧與修辭。相較之下，前者可能確實較具有某種班氏所謂的「靈光」。不過從藝術史與書籍史的角度來看，一本詩集不單只由詩人（作者）完成，還包括出版、印刷、設計等共同創作者。不同的組合因素，也對詩集的「靈光」有所影響。

主題論壇

劉瓊云老師引言，三天進行的九場演講，打開了一個更大的空間，可供繼續討論、思考文學與媒介，從寫本到數位課題。因此在研習營最後，規劃邀請中研院文哲所劉苑如、李育霖、楊玉成三位老師從各自專業領域出發，就研習營的主題，分享他們的觀察與省思。

長年經營數位人文研究的劉苑如老師，從各類電子文獻網站的建置談起，指出現今的文本形態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且不斷演進。劉老師團隊建置的「葉德輝藏書閣——清末民初文人的知識圖譜平臺」資料庫，就採用發展自 OCR 技術的 CText「圖文對讀」模式。此資料庫在數位化的過程中，除了文字文本，也保留書中各種牌記、廣告資料，既兼顧書籍的物質性，也利於掌握書籍的流通情況。

老師接著列舉重要的主題式電子資料庫類別，包括：（一）人物傳記資料庫。（二）規範資料庫。（三）工具書資料庫。（四）典故詞彙。例如法鼓文理學院建置的「佛學規範資料庫」，方便研究者檢索佛教重要的人、地、寺廟資料。除了數位化資料，這類主題式資料庫還能透過演算法，進行數據的整合與分析，例如劉老師團隊建置的「疾病感覺地圖」資料庫，導入 GIS 地圖技術，運用「事件」、「地圖」，結合文字史料、地圖定位、版本比對、宗教社會文化思維與文學解讀，深化疾病敘事的研究。此外，中研院史語所開發的「氣象文本資訊系統」資料庫，彙集清代前期 (1644-1795) 地方志與正史中有關氣象紀錄的史料進行巨量分析，有助於環境史研究。而像「葉德輝藏書閣——清末民初文人的知識圖譜平臺」資料庫、中研院近史所建置的「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則可透過大量資料彙整，進行人際交流網絡分析。

劉苑如老師回應劉正忠老師在演講中提到書籍對抗數位化的問題，認為對現今研究者來說，如何使書籍在數位化過程中不斷增值，兼顧書籍物質與文本性，是有

待大家持續思考與努力的課題。資料庫類型的數位文獻，使人文學研究者能夠並用遠讀與細讀兩種閱讀策略，既深入文本，也能透過運算，掌握文本外緣訊息，從更寬闊的視野理解文本的整體社會脈絡。

嫻熟於當代文學文化理論的李育霖老師，就數位文本的文本性 (textuality) 展開思考。上世紀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提出「作者之死」概念後，「讀者」的文本闡釋權也由此誕生。老師認為隨著數位科技介入，「數位之死」的時代終將來臨，後續效應可能比百年前印刷術的發明，更具革命性。例如，數位文本的作者與讀者問題：除了寫作的作者外，選取數位化資料、建置資料庫的規劃者等人，是不是可以當成作者？讀者除了是解讀文字符號的人，數位化資料 coding 或 decoding 的操作者們是否也成為新的讀者呢？此外，文本的性質、格式改變了，數位檔案化，是否就一定能保存得更長久？這些都是「數位之死」概念下，可以持續思考的問題。

老師進一步談論數位文本的特質，指出：我們已經從過去羅蘭·巴特的「符號」理論 (semiotics)，進入了電腦演算「符碼」(coding) 時代。數位文本的構成必須透過電腦運算，換言之數位文本的根本性質蘊含數位性 (digitality)，而數位性基本上是理性思考的語言：從文本介面的構成以及它的擬真性，都是數位運算的結果。不同於書籍占有空間乃實體存在，數位文本仰賴平板、手機等介面，介面一旦關閉，文本便消失。

再者，數位文本的建置仰賴軟體格式，軟體格式於是成為數位文本知識構成的基礎，建置者選用什麼樣的軟體格式或電腦語言，背後可能隱含意識形態，如此一來，數位文本不免帶有政治性，預先設定了知識構成的形態。而由於資訊量龐大，且數位環境容許文本不斷向外連結，因此其知識理型偏向廣泛的「知曉」，而非深度「理解」。再就傳播形態思考，數位文本是否帶來更「自由」的資訊流通呢？這個問題其實相當複雜。相對於我們所熟悉的實體圖書館管理，被檔案化、數量龐大且不斷向外連結的數位文本，受運算程式、軟體格式等科技工具制約，這類文本如何可能被管理？網路上的資訊如何被保管？便利迅速的訊息傳播是否確實能帶來知識的多元開放？還是另有其他陷阱？這些都是值得繼續觀察、思考的問題。

李老師最後談數位時代的美學與倫理議題，談到數位文本除了文字符號，還增添許多影像和聲響。如 AR、VR 等技術，講求與身體感官的聯覺共感，與文學的「情動性」(affectivity) 相互連結。老師希望提醒大家關心數位時代的倫理問題，思

考人類生命有哪些感性的部分，是無法被數位化的？面對本質為格式化演算的數位文本，我們如何能夠獲取抵制數位機械性、程式性控制人類身體的可能？另一項重要的倫理議題是未來的保存，老師引用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話總結：「檔案數位化不是過去的問題，也不是打破東西重新保存起來。這些保存的是朝向未來的，是屬於未來的問題。因此我們現在的保存、檔案化，都是對於明天的一種責任跟承諾。」

楊玉成老師聚焦數位化與書籍史兩個概念，分享自己參與三天會議感受到的衝擊與心得。從研習營一開始，因應疫情不得已從原本的實體課程改為線上，到研習營最後一晚，學員們彼此依依不捨在線上舉杯話別。每一位參與者雖受限於網路系統，但同時也親身體驗數位的力量；實體會議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但線上會議也有其積極功能。同樣地，近年世界各大圖書館因應疫情，紛紛建置、開放數位資料庫，將各自珍貴館藏數位化線上公開分享，實踐學術「公共財」的理念，這也使現在成為進行書籍史研究的絕佳時期。

書籍史研究方面，楊老師聆聽九場內容豐富的演講後，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感受，一方面深切體認到書籍史研究的廣大潛力，許多領域仍有待開發耕耘。例如《申報》的刊行時間長、數量龐大、內容駁雜，如何駕馭這類材料本身就是一大問題，更遑論其他高達數千種的報刊。另一方面感覺到研究者專業分工，可能產生的「年代的落差」。中國古典文學有漫長歷史，每位研究者各自在自己專精範圍中發展。但如同王德威先生曾說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反映文學史中新、舊之間經常存有複雜的脈絡，研究者應對此進行反思，並積極突破既有的時代的局限。

楊老師最後提示書籍史研究中有待發展的方向。本次研習營主題涉及文本形態的變化，包括從寫本到現代文學，或版本差異。研究者應進行差異的閱讀，並打破既有穩定、不變的文本概念。如目前通行的《詩經》版本，是歷代刊行者編輯的結果，若將其與出土文獻相比，可以發現顯著的差異。在此脈絡下，版本研究顯得別具意義，版本間的流動與編寫者的建構，具有多元且豐富的文化意涵。其次，在出版文化視野下，書籍從作者創作、編輯、刪選，到出版、書坊發售不同階段，書籍傳播迴路的各個環節以及彼此間的關聯，仍有待深究。其三為閱讀接受史，老師進行評點研究時，注意到留存於眉批或其他副文本中的讀者留言。這些為數眾多的文獻，有助於研究者從接受美學視角展開讀者研究，甚至進一步擴大範圍，觀察漢籍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傳播過程中，文化、國族認同等各項議題。